

繪製「香港文學」： 盧瑋鑾《香港文學散步》的文學地誌與地方認同¹

鄒芷茵²

摘要：本文分析《香港文學散步》（下稱《散步》）如何以「文學地誌」來建構「地方認同」，並闡釋書中呈現的 1980 至 1990 年代「香港文學」主體論述。《散步》由香港文學研究者盧瑋鑾（小思）撰寫和編輯，為地誌文學選集。以往研究著重於《散步》對推廣香港文學教育的貢獻，而忽略其香港文學史意義。本文指出，《散步》以蔡元培、魯迅等作家來繪製香港文學地誌，呈現了盧瑋鑾於 1980 至 1990 年代，以現代華文文學為本的「香港文學」主體論述。盧瑋鑾賦予新文學作家一種「香港文學史」意義，同時展示香港學者面對本地「香港文學史」缺席的困境。

關鍵詞：《香港文學散步》、盧瑋鑾（小思）、文學地誌、地方認同、香港文學史

¹ 收件日期：2019/11/01；修改日期：2020/02/19；接受日期：2020/03/01

²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Mapping“Hong Kong Literature”: Literary Topographies and Place Identity in Lu Wei-luan’s Hong Kong Literary Walk³

Chau, Tsz Yan Emily⁴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place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by the literary topographies, as well as explains the form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from 1980s to 1990s in Lu Wei-luan’s Hong Kong Literary Walk. The work Hong Kong Literary Walk is written and edited by Lu Wei-luan (Xiao Si). It is presented as an anthology of topographical literature. Scholars generally agree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Literary Walk carries the pertinence to the educ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but it has yet to b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Lu wrote Hong Kong Literary Walk from 1980s to 1990s and shaped the subjectivit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by mapping literary topographi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n Hong Kong, including Cai Yuan-pei, Lu Xun, etc. She put the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nto the plot of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and showed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of local scholars

³ Received: November 01,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February 19, 2020
Accepted: March 1, 2020.

⁴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the absence of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which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them.

Keyword: Hong Kong Literary, Walk Lu Wei-luan(Xiao Si), literary, topography place identity,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一、前言

《香港文學散步》（下稱《散步》）由香港文學研究者盧瑋鑾（1939-，筆名小思，下稱「盧氏」）撰寫和編輯，⁵ 歸類為地誌文學選集，以現代華文文學作家之旅港生活繪製「香港文學地誌」。本文分析《散步》如何以「文學地誌」來建構「地方認同」，並闡釋書中呈現的 1980 至 1990 年代「香港文學」主體論述。

1980 至 1990 年代，《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正式落實，香港逐漸步入「回歸時代」。此時，香港文學研究者積極建立中港文學交流平台，以各種書寫、討論或研究，來回應本地學界對現當代華文文學和香港文學研究，尤其是「香港文學史」書寫的追求；《散步》便是其中矚目一員。此書以蔡元培、魯迅等著名現代華文文學作家之旅港生活、香港書寫等文獻資料，組成多種「文學地誌」。

盧氏是香港文學研究者，所藏之香港文學史料數量甚多，為香港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出版著作《散步》廣受歡迎，歷年不斷再版、翻譯。⁶ 一直以來，因香港地誌文學研究數量不多，而且《散步》之體例複雜，性質難以劃分：故討論《散步》文學價值的研究者寥寥。

趙曉彤在〈造筏不渡河——從盧瑋鑾日本遊學經驗論其香港文學研究方法之承傳〉裡，曾詳細討論盧氏的治學方法與文學

⁵ 盧瑋鑾（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 年，初版）。

⁶ 詳參本文「二、香港文學地誌與『香港文學』主體性」。

教育理念，與其於 1973 至 1974 年赴日學習之關係。趙氏在「『香港文學散步』：史料與史感的互補」中略論「香港文學散步」之教育理念，分析現場散步活動的「重返史感」和「建立人文亦自文學建立對本土歷史文化的關懷」之功，並初步論證「文學散步」乃取法自「人類學的民族誌法」。⁷ 趙氏的著眼點在於《散步》的史學教育貢獻，肯定它的教育功能。

唐睿曾在〈文學地景中的身份意識——從文學散步到地景書寫〉裡，嘗試以地誌書寫分析「香港文學散步」活動與參加者的身份意識之關係。⁸ 他著重分析「文學散步」對參與者的影響，認為參與者可以「通過書寫地誌文學、建構文學地景，並最終產生出一種建構自我身分的意識」。⁹ 提到《散步》的寫作目的，他肯定其教育功能，看法與趙曉彤的相近：

通過這些介紹，盧教授希望讓讀者明白，香港實際是個具備

7 趙曉彤：〈造筏不渡河——從盧瑋鑾日本遊學經驗論其香港文學研究方法之承傳〉，《中國現代文學》，第 30 期（2016 年 12 月），頁 216-217。鑑於「民族誌」（Ethnography）為學術研究方法，除觀察外，還涉及多次行動、訪談、脈絡化步驟等長時間考察程序，故「文學散步」須待研究者更深入討論其考察程序在與民族誌相通之處。

8 唐睿一文資料非常詳盡，惟有若干不準確之處，如誤認「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所列之歷年散步文學活動皆由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主辦或合辦，進而詳細推論此中心的活動宗旨和所涉及之身分意識變化；誤述「香港文學行腳」由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合辦及負責開列書目，而活動舉辦者實只為公共圖書館和香港電台，而書目皆由嘉賓主持、導賞員提供。詳見唐睿：〈文學地景中的身份意識——從文學散步到地景書寫〉，《人文中國學報》，第 25 期（2017 年 12 月），頁 169-192。

9 唐睿：〈文學地景中的身份意識——從文學散步到地景書寫〉，《人文中國學報》，頁 171。

歷史和文化的地方，而香港的年輕一代，實在應該繼續傳承過去的文化。……為了更有效地將這種觀念傳播出去，盧教授決定以「文學散步」的方式，親身帶參與者走訪各個盛載著文學史記憶的地景，期望通過「現場感」，強化學生對前人以及前人事迹的認知，而更重要的，就是產生感情。¹⁰

趙、唐的看法，著重於《散步》對推廣香港文學教育的貢獻，而未有關注其香港文學史意義。盧氏在《散步》裡的〈文學的步履——六國飯店懷舊〉裡說：

應該是一九四一年之前，我曾躲在八層高的六國飯店的大堂裡，避過盟軍飛機轟炸灣仔海上日本軍艦的炮火……一直到我研究香港文藝發展，從資料裡，才發現許多莊嚴活動在那裡舉行過。六國飯店的名字，緊緊和四十年代的中國文藝南方發展連在一起。¹¹

在盧氏的經驗裡，「六國飯店」的空間經驗，會隨個人的空間認知變化而改變；這種在地誌文學裡的、地圖上的、散步路線上的香港文學元素，是經驗者所思考而成、繪製而來。《散步》無疑可作為一本香港文學史的教科書；然而《散步》生產「香港文學地誌」的原因，則是個非常值得在學術研究上追蹤的問題。

本文分析的研究問題包括：一、「文學地誌」與文學「主體性」的關係，包括《散步》以什麼香港文學元素組成、這些香港文學元素呈現了怎樣的主體性；二、《散步》「地方認同」所反映的香港

¹⁰ 唐睿：〈文學地景中的身份意識——從文學散步到地景書寫〉，《人文中國學報》，頁 176。

¹¹ 盧瑋鑾：〈文學的步履——六國飯店懷舊〉，《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 年，初版），頁 155。

文學史書寫困境，包括《散步》追求歷史情感的原因、箇中揭示的身分認同危機。

本文認為，《散步》以蔡元培、魯迅等作家來繪製香港文學地誌，呈現了盧氏於 1980 至 1990 年代，以現代華文文學為本的「香港文學」主體論述。《散步》以文學建構的地方認同，反映香港學者於冷戰和中國改革開放後，所面對的香港文學研究及「香港文學史」書寫困境。

二、香港文學地誌與「香港文學」主體性

（一）《香港文學散步》的體例

以下，本文先說明《散步》之體例，再行分析《散步》的「香港文學地誌」建構方式。《散步》現有 1991 年、2004 年、2007 年及 2019 年，共四個繁體中文版；另有日文版（2005）和簡體中文版（2015），內容每有增訂之處，致其文類亦見變化。¹²

《散步》雛形為盧氏在 1987 年於《星島日報·星橋》發表的「香港文學散步」專欄散文，可見盧氏於 1980 年代末已有書寫香港「文學地方」之志。從 1991 年的初版開始，《散步》即具複雜之體例，

¹² 包括盧瑋鑾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 年，初版）；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 年，新訂版）；小思編著，岩佐昌暲、間ふさ子譯：《香港文學散步》（福岡：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較社会文化学府国際言語文化講座，2005 年，初版）；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7 年，增訂版）；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 年，初版）；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9 年）。

內容兼具作者個人散文與其他現代華文文學作家散文、現代詩；後來的版本更附文學地圖、實地照片，又配以讀者徒步旅行之用的散步路線；更加入盧氏自述之「選文思路」、編輯對談等，內容種類不斷擴充。以下是「初版」第一章之內容：

一、蔡元培		
篇名	著者	寫作時間
五四歷史接觸	盧瑋鑾	1987.05.04
頑石——蔡子民先生之墓	周策縱	1977.06.25
蔡元培墓前	余光中	1978.04.05
遊蔡元培之墓	黃國彬	1977.06.25
在香港聖約翰大禮堂美術展覽會演詞	蔡元培	1938.05.20

若只以《星島日報》底稿而定，《散步》應歸類為散文集。《散步》結集後，盧氏散文的篇幅在《散步》裡所佔內容比例不高，如蔡元培一章只有一篇為盧瑋鑾所撰；其餘內文以盧氏所編輯之他人作品為主，如以上的周策縱、余光中等。內容各自圍繞不同的、寬鬆的地誌題材，故可以歸類為「地誌文學選集」。

「初版」設計以文字為主，實用性本不大；至日後的新版本，則漸漸增加實用的功能。再以蔡元培一章為例，「初版」並沒有地圖、實地照片、旅行路線，卻保留了《星島日報》專欄曾刊出的蔡元培照片、墨蹟；盧氏為蔡元培撰寫的散文〈五四歷史接觸〉之內容，亦以蔡元培的生平事蹟為主。整體來說，其實用性不大，視覺

地誌及具體地景書寫不多。¹³ 至 2004 年的「新訂版」，蔡元培一章除增加了實景插圖外，還增加蔡氏之「生平簡介」及「香港足跡」，附概括的香港島島形圖來標示蔡氏墳墓、演說地之所在，並存由盧氏所撰的「選文思路」，說明作品入選原因。¹⁴ 2007 年的「增訂版」進一步增加作品、實景插圖的數量，另添編輯與盧氏對答的「與小思對話」，以及指路功能更具體的散步地圖。¹⁵ 至 2019 年，「第三次修訂本」撤去了地圖，另加入更多作品、實景圖片及與盧氏對答的「伴步者對話」。¹⁶ 總括而言，由 1991 年「初版」至 2007 年「增訂版」，《散步》之文類定位由「地誌文學選集」發展成具實性、以期供讀者親身旅行實踐的「文學旅行指南」雛形；惟此實用風格，至 2019 年「第三次修訂本」再度消失，回歸著重文字的紙上旅行。以下，本文運用「地方」概念，分析《散步》具有什麼地誌元素。

（二）空間·地方·地誌·地景

「空間」(space) 所盛載的意義本為流動，當意義凝固時，「空間」便會再現成不同的「地方」(place)。從文字書寫而言，文學作品裡的空間書寫與其指涉之真實地理空間，抑或文學作家生平地理空間，也是凝固意義的元素。當「空間」的意義以文學元素凝固

¹³ 盧瑋鑾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 年，初版），頁 3-17。

¹⁴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 年，新訂版），頁 2-17。

¹⁵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7 年，增訂版）。

¹⁶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9 年）。

下來，這些「地方」可以稱為文學地方（literary place）、「文學地誌」（literary topography）或「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地方」（place）、「地誌」（topography）、「地景」（landscape 三者在華文文學研究裏時有互通，¹⁷ 但意思並不相同，可說是不同學科對「空間」的不同描述。

段義孚（Yi-fu Tuan）曾明確點出「地方」與「空間」的分別，至今仍為研究者所沿用。他認為「如果我們將空間視為允許移動，那麼地方就是暫停。」¹⁸ Tim Cresswell 在段義孚的說法上，提出「地方」之於「人」的意義：「地方不僅是世間事物，還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當「特定地方的既定意義和實踐越清晰，就越容易逾越伴隨「人」對地方的期望」。¹⁹ 論及「地方」與「文學」的關係，Mike Crang 早已提出文學創作的空間書寫之於「地理學」（Geography）的價值，除了提供空間數據，還提供了「空間」的創造：「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²⁰ 因此，「地方」與「空間」不同之處，在於

¹⁷ 在華文文學研究裏，以「地誌」、「地景」為「空間」書寫概念比較常見；可參陳大為：《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 1980-1999》（臺北：萬卷樓圖書，2001 年）；林淑貞：〈地景臨現——六朝志怪「地誌書寫」範式與文化意蘊〉，《政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59-193；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成功大學中文學報》，第 29 期（2010 年 7 月），頁 143-160。

¹⁸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p.6.

¹⁹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1、165。

²⁰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 年），頁 58。

加入了意義；而這些意義往往來自「人」。

「地方」是個廣義的概念。「地誌」是「地方」的再現；相對於包含各種空間意義的「地方」，「地誌」更著重空間的名命、陳述。「地誌學」(Topography)作為術語，可指為廣義「地理學」的地貌描述工具，如等高線、比例尺等；如作一般用詞「地誌」，則指地形陳述。文學研究與地形研究的研究對象完全不同，故不以「地誌學」工具分析文學作品，而借用地誌學陳述空間的術語來思考空間與文字的關係。J. Hillis Miller 在《地誌學》(*Topographies*)專門討論地誌(topographies)在文學作品的功能，是從「書寫地方的文字」過渡至「根據相對的地圖繪製系統符號所呈現的地景」的描述方式，²¹ 包括任何與命名「空間」、由「空間」轉向對特定對象富有意義的「地方」(place)的相關文字，如繪製地圖的地名(toponym)、地理文獻、航海日記或旅遊指南等。Tim Cresswell 在《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中，以 Jonathan Roban 航海日誌《航向朱諾》(*Passage to Juneau*)為例，指特領吉族印第安人(Tlingts)替海洋取了許多名字，但是陸地卻沒有名稱，幾乎是隱形的，因為海洋是他們的居所，所望見的並不是一個海的「空間」，而是一個「地方」，是一個對特定對象富有意義的「空間」。²² 在這例子裡，特領吉族印第安人的海洋是「地方」；而海洋的名字，則是再現「地方」的「地誌」了。

「地景」(landscape)也是其中一種「地方」——富有意義的

²¹ J. Hillis Miller, *Topograph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6.

²²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7-19、21、165。

「空間」，本專指特定以繪畫藝術裏以地理風景為題材的作品，²³比「地方」強調人的視覺、視野，而不是「地誌」的命名、陳述。Mike Crang 沒有很明確地劃分「地方」、「地景」的分別；但他強調「地景」的集體、社會面向，如都市生活、社會脈絡等。²⁴視點方面，Tim Cresswell 則指出，「地景」是「我們可以從某個地點觀看的局部地球表面」，結合了「有形地勢」和「視野觀念」；它與「地方」的分別在於，「地景」不是人的居所，而是人所觀看的對象：「在大部分地景定義中，觀者位居地景之外。這是它不同於地方的首要之處。地方多半是觀看者必須置身其中。」²⁵至於「地誌」與「地景」的關係，J. Hillis Miller 認為「地誌」兼具系統符號（地名）和呈現對象（地景）、把文學作品連結至某一特定的歷史或地理時刻的書寫意義。²⁶也就是說，「地誌」是「地名」與「地景」在特定時空裡的組合。

本文以「文學地誌」為分析《散步》空間書寫的概念，因「地方」一概念過於概括、抽象；而《散步》只有定點、具名的可命名的真實空間，如蔡元培之墓、域多利監獄、孔聖堂等，而並非「有形地勢」和「視野觀念」的空間秩序。本文關注之處，在於盧氏如何以文學元素來命名已存在的「地方」，以再現為「文學地誌」；以及這些「文學地誌」所衍生的「地方認同」，對香港文學史書寫帶來

²³ 詳參 Denis E. Cosgrov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London: Croom Helm, 1984)。

²⁴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頁 60-61。

²⁵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頁 19-21。

²⁶ J. Hillis Miller, *Topographies*, p.4-6.

什麼影響。

(三) 文學地誌：從「空間」到「地方」

1. 「香港文學散步」的起源

《散步》以「文學散步」(literary walk)的方式、蔡元培等作家來繪製「香港文學地誌」，呈現了小思於1980至1990年代，以現代華文文學為本的「香港文學」主體論述。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大學圖書館合辦的「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的「關於文學散步」裡，有一則「文學散步」來歷簡介：

「文學散步」由盧瑋鑾教授於多年前提出，並出版了《香港文學散步》一書，希望通過文學景點實地考察，推廣香港文學。「文學散步」的理念在於讀者身體力行，直觀感受文學的現實場景，加深對作品的認識。²⁷

以上簡介似乎面向公眾而寫，故採用簡略、普及角度來說明「文學散步」。其說法宜有兩項訂正之處：一、盧氏是「文學散步」的「提倡」者，而非「提出」者。黃繼持在《散步》的〈序〉中提到當時的巴黎、倫敦等城市，已有遊覽地圖、「文學行腳」地圖等類近成品。²⁸ 如就亞洲地區而言，「文學散步」這個用詞，早已在日本出版界興起、普及：如永井荷風的《東京散策記》、²⁹ 野田宇太郎的《新

²⁷ 「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網頁：<http://hkliteraryscenes.wikidot.com/about>，瀏覽日期，2019年11月11日。

²⁸ 黃繼持：〈行腳與傾聽——小思《香港文學散步》引言·序〉，《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年），頁I-V。

²⁹ 承蒙審查老師建議加入永井荷風之《東京散策記》資料，謹此致謝。永井荷風之《東京散策記》書名常寫成《日和下駄：一名東京散策記》。中譯

東京文學散步》等。³⁰ 永井荷風《東京散策記》以永井荷風於 1914 年在《三田文學》（三田文学）之連載散文專欄結集而成，書寫日本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之東京景觀。野田宇太郎於二戰後開始撰寫有關「文學散步」之專欄散文，其後編成《新東京文學散步》，一紙風行。野田宇太郎撰寫「文學散步」之動機，源自戰後東京廢墟處處、物事全非，以及社會上否定過去的聲音；這些東西讓他產生了「用腳書寫近代文學史」之念頭，遂有「文學散步」之創作行動。「文學散步」本具文學史書寫之功能，這是可以肯定的看法。

盧氏雖從未明言她所關注的日本文學散步是否啟發自野田宇太郎等人，但她曾於 2012 年接受沈舒（馬輝洪）訪問時，提到日本文學散步書寫對《散步》的影響：

這個概念來自日本。……我想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參加了「伊豆舞孃文學散步」。……從日本回港後，我繼續教書，但心裡一直想：日本人熱愛文學散步的現象，是否可以在香港出現呢？……我漸漸萌生了一個想法：我尋訪南來作家足跡時感受甚深，其他人會有相同的感受嗎？……辦過第一次香港文學散步後，有參加者希望了解作家的作品和心路歷程，從而進入作家的生命。於是，我開始有了出書的念頭。³¹

盧氏以上自述，點明了《散步》的出版意念，是源於她的日本文學散步經歷，以及她在香港真實舉辦香港文學散步活動的經驗。

本有永井荷風著，林皎碧譯：《荷風の東京散策記》（臺北：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2013 年）。

³⁰ 野田宇太郎：《新東京文學散步》（東京：角川書店，1952 年，增補訂正版，再版）。

³¹ 沈舒訪問、撰文：〈訪問盧瑋鑾教授〉，《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9 年），頁 348-351。

2. 以現代華文文學命名的「文學地誌」

從不同版本《散步》的體例可知，《散步》並非如「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所言，「從希望通過文學景點實地考察，推廣香港文學」，而是推廣在「香港」體現的「文學散步」——其中的「文學」，尤應作「現代華文文學」、「中國新文學」。《散步》基本以盧氏為蔡元培、魯迅、戴望舒、許地山及蕭紅五位現代華文文學作家所寫的十一篇散文為綱，按人物特寫和地點特寫分成「上篇：憶故人」、「下篇：臨舊地」兩部分，加上數量更多的作家創作或他人回顧文章組成；因此，《散步》之「初版」以盧氏為「編著者」，另標「小思」；是「編輯」，多於「著述」。至2004版本至2019年版本，作者寫法改為「小思」，則陸續加入香港文學散步地圖、所選作家「生平簡介」、「香港足跡」、盧氏親撰的「選文思路」、出版社編輯策劃的「與小思對話」等內容。

自《散步》之「初版」起，每篇盧氏自撰散文和轉載作品，大多於文末標明寫作時間。由於《星島日報·星橋》於1989年8月結束，因此，從以下「初版」目錄可見，《散步》的《星橋》專欄底稿應由「上篇：憶故人」六篇為主，而「下篇：臨舊地」應為專欄結束後至成書前的新撰內容。³²

盧氏「從希望通過文學景點實地考察，推廣香港文學」，實為推廣在「香港」體現的「文學散步」，原因在於《散步》所選之五名作家，均為短期停留、旅居或移居香港的新文學創作者。如以盧氏當時的研究範圍來把「香港文學散步」理解成「香港文學的散

³² 詳參本文「附錄」。

步」，即視魯迅等作家為「香港文學」的一部分；這是否一個合理的理解方式？再次細看黃繼持為《散步》所寫的〈序〉，似乎能見端倪：

論文化談文學，大抵香港本身不能抽離於中國整體之外，香港迄今似乎還是罕見全國地位的偉大作家。但勾稽史迹，遠在半個世紀前，此地早已有過不少作家活動。³³

盧氏並沒有在《散步》「初版」留言，而至 2004 年「新修版」添上自序：

自清末以來，原來不少著名文化人，都曾踏足香港。他們可能只是路過，卻同時也散播著文學、文藝及文化的種籽。這些學者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往往被歷史遺忘了，但這種遺忘，對他們、對香港來說，都很不公平。

我蒐集了很多材料，如果用嚴肅的、學術的方法來推廣，對年青一輩，未必適合，所以我採用了較輕鬆的處理手法，這就是「散步」。³⁴

盧氏把自己著述《散步》的心跡；所盼「推廣」之事，已說得非常明顯：以新文學作家為地誌符號，藉標誌「香港」空間（space），形成以「文學」來示意的地方（place）；換句話說，即以中國新文學作家繪製香港的「文學地誌」。

以上篇「憶故人」中的「魯迅」一章為例，盧氏為魯迅撰文〈彷彿依舊聽見那聲音〉時，以「你」為敘述對象，從中環荷里活道古

³³ 黃繼持：〈行腳與傾聽——小思《香港文學散步》引言·序〉，《香港文學散步》，頁 II。

³⁴ 小思：〈序·歷史有情、人間有意〉，《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 年，新訂版），頁 i。

玩店的「真真假假」的「歷史」，談到樓梯街與必列者士街交界的「青年會」，就是魯迅於 1927 年曾來港演說的場地：

是的，是魯迅，一九二七年二月，由中國到香港來，在青年會作了兩次演講。當年香港給魯迅的印象並不好，但卻並不妨他對年輕人的殷殷寄望。他說：「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可以變的。」在兩次演講中，他也表達了對中國命運的關切和求變的信念。六十年過去了，你試試站在古老的小禮堂裡，依舊，彷彿聽見魯迅的聲音。³⁵

後於〈選文思路〉中，盧氏特意重申魯迅在香港的演講之意義為：

他要借這個英國殖民地南方小島，作為他對自己國家的關注和提醒——香港歷來都能給人提供許多發言空間。……魯迅用刀一般的筆觸，直剖中國文化和國情。³⁶

又或〈寂寞灘頭〉裡的蕭紅與淺水灣，以「新文學」作為唯一空間主體的意圖也清楚不過：

淺水灣，無端地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名字，都同女作家有關。張愛玲借著白流蘇與范柳原，讓淺水灣變成無盡又不斷翻新的愛情故事舞台。而蕭紅，卻是一個浪蕩的孤魂，找不到歸路，流落在太平洋的邊緣，叫許多人想起淺水灣。³⁷

以上可見，《散步》的地誌書寫，即「青年會」、「淺水灣」，

³⁵ 盧瑋鑾：〈彷彿依舊聽見那聲音〉，《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頁23-24。

³⁶ 小思：〈選文思路〉，《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年，新訂版），頁27。

³⁷ 盧瑋鑾：〈彷彿依舊聽見那聲音〉，《香港文學散步》，頁94。

實為盧氏的新文學地誌書寫。盧氏以新文學作家賦香港的地名（toponym）予新的空間意義；相關空間的其他地誌意義，並不算立體。其餘章節如蔡元培與香港仔、戴望舒與薄扶林，也有相類情況。因此，《散步》以現代華文文學、中國新文學為香港地誌空間認知（spatial cognition）的符號。

（四）「香港文學」主體性

自初次出版至今，《散步》於香港出版界、教育界獲極大迴響，再版不斷，後繼承傳者無數；但從上文的「文學地誌」可見，書中的「香港文學」主體性，並非建構自 1980 至 1990 年代的當下香港文學場域，而來自 1940 年代以前的新文學名家足跡；是屬於過去的、歷史的記憶。盧氏曾於 2007 年「增訂版」出版後數年，說明《散步》以新文學為「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現象：

如果現在可以改書名的話，我會用《香港文化散步》或《香港，文學散步》，包含面就可以廣一些。我當時的想法是：我從事的研究是香港這個範圍裡的文學活動情況，所以我界定的香港文學，與現在的定義略有不同，但我沒有在書中解釋這個說法。³⁸

如盧氏所言，「香港文學」之定義實已歷經變化。《散步》之書名，宜保留原寫，以保存一代概念。「香港文學散步」這個書名，與書中的「香港新文學地誌」的組合，反能凸顯其中一種 1980 至 1990 年代「香港文學」主體論述的思考方式。

有關「香港文學」主體生成之說法，學界一般支持從文學生產

³⁸ 沈舒訪問、撰文：〈訪問盧璋鑾教授〉，《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頁 353-354。訪問於 2012 年 3 月 22 日完成。

的角度來界定，以 1970 年代為意識萌長期，至 1980 年代方發展成熟期。黃繼持指出「香港文學主體意識的喚起，始自五十年代」，但直至 1970、80 年代才可見「屬香港之文學」；³⁹ 洛楓則提出早在 1950 至 1960 年代，王無邪、崑南已為「早期反抗殖民地的聲音」，直至 1970 年代形成「以『香港』為寫作對象的創作」，以 1950 至 1970 年代為「本地意識」萌長的過程。⁴⁰

《散步》所展現的「香港文學」主體論述，則形成與黃繼持、洛楓有所不同的思考方式。它的定義比較寬鬆，以文學活動為標準，而不一定包含以香港本土為書寫對象的文學生產。在《散步》「初版」許地山一章裡，盧氏於散文〈三穴之二六一五〉中，點出了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羅便臣道及薄扶林道中華基督教墳場三個地誌，另選入吳其敏〈許地山下世之日〉、許地山〈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探略（節錄）〉。⁴¹ 吳文亦點出了羅便臣道，而許文則沒有涉及與許氏有關的香港地誌。⁴² 至 2004 年「新訂版」，盧氏以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薄扶林道中華基督教墳場兩個地誌為許氏的「香港足跡」，並撤去〈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探略（節錄）〉，而增選許氏來港前之新文

³⁹ 黃繼持：〈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發展〉，《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92-100。發表於 1993 年，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聯合報副刊・聯合文學雜誌社合辦「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

⁴⁰ 洛楓：〈香港現代詩的殖民主義與本地意識〉，《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36-237。另刊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頁 269-290。

⁴¹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 年，初版），頁 3-17。

⁴²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 年，新訂版），頁 2-17。

學名作〈落花生〉。⁴³於 2019 年的「第三次修訂本」，〈落花生〉依然榜上有名⁴⁴由此可見，盧氏的「香港文學」主體性，是以「作家」為單位，以從事之文藝活動或語文教育事業為衡量標準，而非關創作題材。

雖然盧氏稱《散步》「初版」對「香港文學」的看法或已不合時宜；但黃繼持、洛楓之說，實同發表於 1990 年代初，故可看為與《散步》時代相同之論述。為何《散步》所持「香港文學」主體論述較黃繼持、洛楓為不同？本文結合「地方認同」、盧氏當時的香港文學研究和文學史書寫語境來說明。

三、「地方認同」與「香港文學史」

(一) 地方認同

以下，本文分析《散步》以文學史展現的「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 place-identity)。首先，本文須說明「歷史」與「地誌認同」的關係。當「空間」變為一個對特定對象富有意義的「空間」，也就是「地方」時，由特定對象對所產生的情感，可以稱為「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感」是個概括的概念，因為「情感」、「認識」具有無數面向。J. Hillis Miller 則認為，「地方感」從「地方」的角度去考慮人與所在地空間的關係，所呈現的是「人類與世界連

⁴³ 許地山：〈落花生〉，《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 年，新訂版），頁 84-85。

⁴⁴ 許地山：〈落花生〉，《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9 年），頁 116-117。

結的先天能力」、「對地方位置的準確認識」。⁴⁵

Edward Relph 為較早建立「地方感」理論的、較早期應用「認同」來討論「地方感」的學者，他認為「地方感」就是「認識不同地方及不同的地方認同（identity of place）的能力」，而這種「地方認同」經常以人對該地的經驗（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為基礎，是以人、時間、空間三者組成人對「地方」的感覺。⁴⁶ 從人與所在地的關係來考慮的話，則個人身分認同其實建構自所在地空間、所在地歷史；因此，個人身分認同，實際上也是由富有意義的「空間」（「地方」）所建構出來的。

「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理論則由「環境心理學」（environmental psychology）研究者 Harold M. Proshansky 於 1970 年代提出。Harold M. Proshansky 在眾多有關「地方」的理論上，提出「地方認同」，進一步討論「地方」建構身分認同（identity）的方式。⁴⁷ 與 Edward Relph 的「地方認同」（identity of place）不同，Harold M. Proshansky 雖然同樣探討人對「地方」的情感，但他不以「地方」為研究重心，而著重人於所在地上的行為，而且是面向社會的，受不同歷史與社會情境所影響，屬於「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的一種。

高嘉謙於分析清代遺民在殖民香港集體生產的地誌書寫時，曾總結地誌文學作者可透過書寫歷史及當下空間，來形塑與從屬自己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⁴⁸ 《散步》的「香港文學地誌」並非以

⁴⁵ 詳參 J. Hillis Miller, *Topographies*.

⁴⁶ 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c1976), p.63.

⁴⁷ M. Harold Proshansky,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0,2 (June 1978), pp.147-169.

⁴⁸ 高嘉謙：〈刻在石上的遺民史——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

相關作家的空間書寫，而是以作家的居港生平來建構；換個方式說，即作家的居港生平，就是該空間的歷史、過去，是「地方」形成的元素；而著名新文學家的過去，也就是新文學史了。因此，《散步》裡的「香港文學地誌」，是由新文學歷史建構的「地方」。

「地方認同」可從以下特徵來確認：是屬於內在者（insider）的，具有對「地方」的喜愛之情，即「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對「地方」存有留戀的心理狀態；⁴⁹ 在《散步》裡，盧氏的空間書寫，經常呈現以新文學史、內在者為中心的「地方認同」。她往往以「香港人」之身分，來鼓勵讀者多接觸、紀念具有新文學歷史的香港地誌。她在〈五四歷史接觸〉裡，邀請讀者前往蔡元培之墓：「掃墓，只是個儀式，不必斤斤計較，但如果在五四紀念日的前後，能去蔡先生的墓前致敬，深思蔡先生生前走過的道路，這畢竟是我們香港人可以做到的事！」⁵⁰ 又表現對新文學地誌的喜愛、留戀：「當年香港給魯迅的印象並不好，但卻並不妨他對年輕人的殷殷寄望。……六十年過去了，你試試站在古老的小禮堂裡，依舊，彷彿聽見魯迅的聲音」；⁵¹ 「你不必去找山坡路口的水牌，因為『林泉居』已經拆掉了——它卻永遠存在愛詩的人心中。」⁵² 這種肯定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314。

⁴⁹ M. Harold Proshansky,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0,2(June 1978), pp.147-169.

⁵⁰ 盧瑋鑾：〈五四歷史接觸〉，《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頁 6。

⁵¹ 盧瑋鑾：〈彷彿依舊聽見那聲音〉，《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頁 23-24。

⁵² 盧瑋鑾：〈林泉居的故事〉，《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頁 42。

香港文學地誌的新文學史意義之情感，也就是盧氏當下的「地方認同」。以下，本文進一步探問，《散步》以新文學史作為「香港文學史」之原因。

（二）1980 至 1990 年代的「香港熱」

盧氏的「香港文學散步」書寫先後撰於 1980 至 1990 年代，內容以其 1970 年代完成之南來作家研究成果為基礎。相較於以文學教育或創意寫作活動為定位，《散步》更有 1980 至 1990 年代「香港熱」下的文學史書寫意味。

1980 至 1990 年代的「香港熱」，應從冷戰說起。如果「戰爭」是長驅直進、所向披靡的颶風；那麼，「冷戰」就是從空穴而來卻來去無踪的陰風，在日常之中，開展意識形態的無形戰場。於二戰結束後的 1950 至 1970 年代裡，香港文學場域的冷戰經驗是朦朧的；冷戰各種勢力向香港文學生產傾注大量文藝資源，如亞洲基金會邀請香港作家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籌備友聯社及期下刊物《中國學生周報》和《祖國周刊》等，以量制勝；右派的《香港時報》、左派的《青年樂園》等，又氣質各異。

對曾經身處冷戰時代的香港文學研究者鄭樹森來說，這些冷戰時代往香港吹拂的冷風，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冷，甚至能成為文學生產的如水好風：

香港雖然被英國統治了一個半世紀，但和非洲、印度、加勒比海等地不同，並沒有發展出一個英語的文學創作傳統。……但在冷戰年代，兩大霸權在全世界的抗爭、國共兩黨隔台灣海峽的對峙，使到邊陲的香港成為「文鬥」（意識

形態的戰爭) 的交鋒地點，香港的特殊自由，令到連「第三勢力」及「托派」等本來就很邊緣性的聲音，都能在香港這邊陞空間作邊緣發言。⁵³

鄭樹森所言之「特殊自由」，無疑指向香港冷戰時期出版數量多元豐碩，流派百花齊放的文學生產空間。尤其相對台灣的出版環境而言，鄭樹森認為，這是英國「以長期沒有主動和全力爭奪及霸佔上層建築這個重要空間」的結果。⁵⁴

如不從文學生產空間，而從殖民管治的角度來考慮的話，這種寬廣的文學空間，似乎是高明的統治手段。羅永生曾點出，雖然冷戰對香港和台灣影響甚大，但「冷戰」的痕跡在殖民地香港並不容易發掘。他認為相較於「往往集中於分析美蘇兩大陣營的政治和軍事角力」的「西方學界」冷戰研究，「冷戰」加入「亞洲」、「殖民主義」及「民族主義運動」等新關鍵詞後，「實需要進一步的給概念化和理論處理」；而對香港來說，「在社會和政治方面，冷戰給處身晚期殖民主義的香港所帶來的，卻是長期的停滯，它令香港的殖民威權統治得以維持不衰。……它不斷延擱香港的『非殖民化』」。⁵⁵ 羅永生所說的「長期的停滯」，指香港的「自由港」政策反而令香港無法在殖民者之下取得真正的「自由」，因「自由港」本來就是冷戰棋局上的重要棋子。

與「自由港」政策一樣，1950 至 1970 年代香港文學生產的多

⁵³ 鄭樹森：〈殖民主義、冷戰年代與邊緣空間——談四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生存狀況〉，《素葉文學》，第 52 期（1994 年 4 月），頁 20、23。

⁵⁴ 鄭樹森：〈殖民主義、冷戰年代與邊緣空間——談四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生存狀況〉，《素葉文學》，頁 23。

⁵⁵ 羅永生：〈香港的殖民主義（去）政治與文化冷戰〉，《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69、75。

元空間，也一朵在冷戰棋盤上盛開的花——雖然出版數量龐大，但難以生成自主的文學場域。在 1950 至 1970 年代的文化冷戰下，「香港文學」主體性總是在趙滋蕃、阮朗、張愛玲、劉以鬯、金庸之間若隱若現，遲遲未能結案。如上文所見，黃繼持、洛楓皆指出，香港文學場域於 1950 至 1970 年代之間未完全自主。

除了朦朧的冷戰經驗帶來的不自主文學生產空間，「香港文學」主體性更在 1980 年代迎來新一道難題。冷戰勢力提早言和，結束對壘之路。學者討論著述「香港文學史」的可能，而普遍認為「香港文學史」不宜匆忙成書；⁵⁶ 然而，於 1990 年代，「香港熱」研究隨「九七回歸」日加熾熱，多部以「香港文學」、「香港新文學」為題的文學史著，陸續由大陸研究者執筆成書。這些以「香港文學」、「香港新文學」為題、由大陸研究者執筆成書的文學史，包括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⁵⁷ 易明善《香港文學簡論》、⁵⁸ 王劍叢《香港文學史》、⁵⁹ 潘亞暉及汪義生《香港文學史》，⁶⁰ 以及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等，紛紛倉促出版。⁶¹ 這種書寫「香港」之「熱」，似乎並非本地學者所能始料。王宏志於日後回顧，這種「香港文學史」書寫「其實是出現在香港的文學活動和文學現象，而不是要確定和描述『香港文學』本身」。⁶² 本地學者雖提出異議，

⁵⁶ 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香港文學》，第 48 期（1988 年 12 月），頁 9-15。

⁵⁷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 年）。

⁵⁸ 易明善：《香港文學簡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 年）。

⁵⁹ 王劍叢：《香港文學史（電子本）》（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年）。

⁶⁰ 潘亞暉、汪義生：《香港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 年）。

⁶¹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 年）。

⁶² 王宏志：〈怎樣去界定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書寫的一個最基本問題〉，《現

惟未真正為「香港文學史」下筆。

(三) 文學史書寫與身分危機

「香港文學」與「新文學」這兩個概念，常常在文學史書寫中彼此牽引；如「香港文學史」書寫必須面對如何往「新文學」溯源的問題；而「當代新文學史」則難免要考慮以「地區文學」來收編「香港文學」之可能。

在冷戰末期至冷戰結束初期，「香港文學」與「新文學」共融或角力皆變化急速。如以歐美地區而言，冷戰時代常以 1990 年代初的東西德統一及蘇聯解體為「解凍」指標；然而，中國隨著文革結束，以及 1979 年中美建交兩事正式結束與冷戰關係，1970 年代末步入改革開放時代，並牽動香港的冷戰情境。羅永曾如此總結中國和香港的冷戰尾聲：「不過，從中國以及香港的角度出發，我們或許也可以提出另一個說法：冷戰早於七十年代初結束了，又或者可以說，冷戰對中國人或香港人來說，結束了多過一次。」⁶³

「冷戰」留在香港的後遺症，就是對香港政治、文學等發展的重大影響。於二戰後至文革年代，中港文學交流雖不至間斷，但一直在殖民政策及冷戰格局下收窄。直至 1970 年代，除可見古兆申、溫健騮等土生保釣運動者，亦見學術研究者，包括盧氏、黃繼持等仍致力連繫中港文學之抱負；盧、黃等研究夥伴所創立的《八方文藝叢刊》（下稱《八方》），便是鮮明的例子。《八方》於 1979 年創刊，至 1990 年共出刊十一期；其刊名似乎有「四面八方」之意，

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8.2 及 9.1 卷（2008 年 1 月），頁 22-39。

⁶³ 羅永生：〈香港的殖民主義（去）政治與文化冷戰〉，《殖民無間道》，頁 90。

以「為中國海內外的文藝工作者，提供一個完全公開的園地」為創刊目的：

在創作上互相觀摩，在思想上互相交流。這是一份全面開放的刊物，將刊登各種不同風格，不同思想的作品，同時刊登各種不同觀點的評論、介紹的文章。但所有文章必須具有認可的質量和水平，所有評論、介紹的文章必須言之有據，言之成理。⁶⁴

《八方》創刊號已刊登兩岸三地的不同作家之作，如錢鍾書、葉維廉、呂赫若、鄭愁予、陳若曦、白先勇、溫健騮和西西等；又舉辦「香港有沒有文學」筆談會，明顯欲以「香港」為本位，以聯繫各地華文文學。除《八方》外，部分研究者提出撰寫「香港文學史」的意見，如黃俊東認為「香港文學史」有其撰寫的條件；⁶⁵ 黃維樑也期望「香港文學史、香港文學選集及香港作家研究」等專著，將隨數量日增的香港文學研究而面世。⁶⁶ 然而，「香港文學史」並未於當時成書。

至於盧氏的此時個人學術研究，則著力於二戰以前的香港南來作家。她自日返港後，於1981年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完成論文〈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1941〉，⁶⁷ 取得哲學碩士學位。此

⁶⁴ 〔作者不詳〕：〈稿例〉，《八方文藝叢刊》，第一輯（1979年9月），頁21。

⁶⁵ 黃俊東：〈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壇的回顧〉，《開卷月刊》，總第11期（1979年11月），頁37-41。此文原為作者在香港大學學生會港大文社舉辦「香港四十年文學史」學習班上的講稿。

⁶⁶ 黃維樑：〈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香港文學》，第27期（1987年3月），頁28。

⁶⁷ 盧瑋鑾：《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1941》（香港：香港大學哲

論文從「中國作家來港的時代」、「中國全國文藝界協會」、「中國文化協進會」、「戴望舒、端木蕻良、茅盾、夏衍在香港」四個角度，冀能「從整理原始資料中，盡量反映這一〔抗戰期間〕時期的文藝活動面貌，並證實香港確有文化中心的地位」，⁶⁸ 可反映除了以「香港」為本位之文藝推動工作外，盧氏個人也關注中港文藝關係的另外一面，就是在全國「抗日的大前提」的、以「中國」為本位而於香港呈現的新文學史面貌。⁶⁹ 取得哲學碩士學位後，盧氏陸續編輯及出版其研究成果，包括南來作家香港時期文選《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1983）、南來作家香港時期文藝活動研究專書《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1987），⁷⁰ 以及《星島日報》的南來作家散步文學專欄散文（1987）。

在香港文學工作者從不同角度尋求中港文學交流空間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為香港文學界帶來了一道「香港文學史」書寫問題。隨著中國「新時期文學」發展漸漸活躍，除了「走向世界」外，也重啟了新文學史書寫行動，並開始關注「香港文學」的內涵；至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香港文學」更成為「新文學史」之書寫題材。盧瑋鑾當時在〈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裡指出「熱愛香港文學的人百般滋味」：

習慣了沒有歷史感，也不預期前景，故對自身的許多問題，

學碩士學位論文，1981年）。

⁶⁸ 盧瑋鑾：《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1941》，頁7。

⁶⁹ 盧瑋鑾：《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1941》，頁3。

⁷⁰ 盧瑋鑾：《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一）》（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盧瑋鑾：《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

並不熱衷研究，就是有人在努力，也引不起大眾的注意。自一九七九年以來，由於政治、經濟等等因素，香港變得十分矚目，香港人忽然回頭來看看這個身處而又一直沒加注意的環境，中國人也驚覺要好好研究一下這個行將我屬的城市，於是，「香港熱」遂成為潮流。文學，自然也同時排在受注視的行列中。香港文學研究，由冷寂到今天的熱鬧，變化實在很大。眼看研究者從孤軍作戰到聯群結隊成了龐大陣容，不叫熱愛香港文學的人百般滋味。我總算是個較早就在這個課題裡探索的人，現試為近十年的香港文學研究情況作一簡要報告，並說說一些自己的看法。⁷¹

自1980年代起，「香港文學」由觀察「新文學」，突然變成了「新文學」的觀察、收編對象。所謂「香港熱」，就是以「外來者」的視野來看「香港」的潮流。這種「看」與「被看」位置互換，導致「香港文學」研究以內地學者為中心的可能，不只是香港學者的研究困境，更是他們的身分認同危機。這種文學發展急速轉向所產生的「百般滋味」，是怎樣的滋味，已經不言而喻。盧氏續指，「香港文學史」只有成書的必要，尚未有成書的把握，不宜於1980年代末倉促撰寫：

由於香港文學這門研究仍十分稚嫩，既無充足的第一手資料，甚至連一個較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記也沒有，就急於編寫《香港文學史》是十分危險的事情。資料不足或採用第二手資料，或加推想出來的文學史，必然十分粗糙，及必有謬誤。而且由於香港文藝發展情況相常複雜而瑣碎，短期內不容易作一客觀而全面的評估。為避免浪費精力及造成不必要的偏

⁷¹ 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香港文學》，頁9。

差失誤，在第一手資料未能確切建立之前，我不贊成在最近的短期內匆忙寫出《香港文學史》。⁷²

這個對「第一手資料」之呼籲外，盧氏具體指出的「香港文學史」書寫可行進程和研究概念，皆為後來研究者所沿用之見解。盧氏認為，在「香港文學」的定義尚未取得共識以前，香港文學研究應轉趨「作家研究」、「選本結集」，從作家、作品等細部研究中，組合一幅比較完整的香港文學拼圖：

許多學者也不再糾纏在爭定義的問題裡，而冷靜地從研究作品、作家、理論探索方面下功夫，例如對侶倫、劉以鬯、梁秉鈞（也斯）、西西、舒巷城、吳煦斌等作家作品研究，已慢慢上了軌道。⁷³

她亦首先提出了「南來作家」（南來文人）的定義，包括他們的身世、題材、筆法、香港意識等，具體闡述南來作家與香港社會的距離，奠定了「香港文學」研究對於「南來作家」與「本土作家」的兩大作家研究脈絡。⁷⁴

此外，盧氏在大陸「香港文學史」出版後，仍未有出版「香港文學史」的念頭；反而於此時出版《散步》，書寫文學地誌，透過以「香港」為本位的「地方」來消解身分認同危機。

（四）香港文學的「地方依戀」

《散步》並非文學史著，盧氏再三在《散步》裡強調「歷史」、

⁷² 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香港文學》，頁 9-15。

⁷³ 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香港文學》，頁 9-10。

⁷⁴ 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20-122。

「地方」、「感情」：

什麼時候有空，走到已變成鬧市的香港仔去，不妨作一次歷史接觸，讀一遍那刻在〔蔡元培〕碑上的墓表，追思前輩為中國民眾教育立下的殊功，或者，我們可以在歷史教科外，多領悟一點歷史教訓，同時，可釀出一腔歷史情懷。⁷⁵

你聽過一條叫屋士蘭里的小街嗎？你當然知道那裡有一間著名的聖士提反中學。斜坡上，綠樹成蔭的小花園，鐵閘永遠用鏈子鎖住，多麼恬靜和優美，蕭紅的一半骨灰，就埋在這裡，一棵大樹下。⁷⁶

我們，生活在和平而繁華的日子裡的人，匆匆在那高牆外走過，有多少能捕捉〔戴望舒〕當年的真實？有多少能體味透滲骨髓的沉哀？⁷⁷

香港文學散步，讓青年人在現實場景裡跨越時空，進入作家的生命！進入他們的境界，從而對文學作品產生感情。⁷⁸

回歸十年，這片土上，人間漸漸在意——在意追查歷史身世，在意保育歷史痕跡，在意關懷與祖國的血脈相連。我們應該珍惜這些前人足跡，珍惜香港特具的一些優點。⁷⁹

⁷⁵ 盧瑋鑾：〈五四歷史接觸〉，《香港文學散步》，頁7。

⁷⁶ 盧瑋鑾：〈幽幽小園〉，《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頁106。

⁷⁷ 盧瑋鑾：〈一堵奇異的高牆〉，《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頁66。

⁷⁸ 小思：〈序·歷史有情、人間有意〉，《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年，新訂版），頁ii。

⁷⁹ 小思：〈序·歷史有情、人間有意〉〔舊題新寫〕，《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7年，增訂版），頁I。

相較於南來作家文選與研究專書，《散步》意圖培養讀者之「情」，對香港具有「地方依戀」（place attachment），繼而建立其「地方認同」。不同於單純喜惡的情感，「地方認同」具有排斥外來者（outsider）的力量。Tim Cresswell 引用了 David Harvey 的理論，總結出「只要地方指涉的是一群人與某處位址之間緊密而相當穩固的關連，地方就會不斷涉及『我們』（屬於某個地方的人）和『他們』（不屬於這個地方的人）的建構之中。如此一來，就建構了圈外人。」⁸⁰ 內在者以「地方依戀」為「地方認同」的特徵；而外來者則可透過積累「地方依戀」，而形為「地方認同」。以身分認同的角度來說，就是排斥外來者；抑或從外來者變成內在者，繼而成為建構空間的主體。⁸¹

相對於黃繼持、洛楓以文學場域是否自主，來作為「香港文學」主體生成的標準；盧氏運用新文學的歷史，來確立「香港文學」的「過去」，則旨在揭示「新文學」與「香港文學」的淵源，而非文學場域自主。《散步》對「香港文學」主體論述的貢獻，非在形構場域的自主性，而在「主體論述」的論述者。也就是說，《散步》裡的文學史，是以香港為空間、以香港學者為論述者的文學史——既是新文學史，也是香港文學史。

至於盧氏所講究的「情」，就是「歷史情感」。她在《散步》「新訂版」的序言裡說：「我很強調『感情』！知識可以在書本中獲得，但知識是死的，人卻是活的、文化是活的、文學更加是活的，

⁸⁰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蒼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頁 67。

⁸¹ B. Hernández, et al.,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Natives and Non-Nativ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7 (December 2007), pp.310-319.

如果能夠讓同學，特別是年輕一輩在現場有所感受、有所感觸，再由自身去領悟一些道理，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⁸² 其中的「情」，正是可以產生「地方認同」的「地方依戀」。揭示未呈現的「過去」，即揭示「遺忘」。盧氏強調歷史情感，固然是以個人的 1970 至 1980 年代進行的南來作家研究成果來書寫空間，以提供「香港文學史」書寫以外的想像「過去」的方法；同時也為「年輕一輩」提供建立「地方依戀」的歷史情境。

四、結語：「文學地誌」的價值

本文認為，《散步》裡的香港文學地誌，以文藝活動所形成，不一定涉及可以對照的地誌文本，反映香港學者於冷戰和中國改革開放後，所面對的香港文學研究、「香港文學」主體論述及「香港文學史」書寫困境。

「歷史」、「空間」、「人」三者文學主體論述裡的角色，至今仍為研究者所肯定。陳國球曾於《香港文學大系·總序》中指出，「香港」經歷了地理上和政治上的不同界劃，經歷了一個自無而有，而變形放大的過程。更重要的是，『香港』這個名稱底下要有『人』」。⁸³

誠然，這種「有情的歷史」作為地誌書寫，確曾為文化記憶的傳承另闢新徑。自《散步》出版至今，「文學散步」確於香港教育界引起極大迴響，孕育更多文學地誌及地誌書寫。近二十年間，香

⁸² 小思：〈序·歷史有情、人間有意〉，《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年，新訂版），頁 i。

⁸³ 陳國球：〈總序〉，《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新詩卷》（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4年），頁 19。

港地誌文學出版、文學地誌散步活動發展均非常迅速，然而，由本地學者撰寫的「香港文學史」，至今仍未可期。此現象所帶出的新難題，似乎是文學地誌建構的歷史情感，仍不足產生具普遍性的「地方認同」，以及成為「香港文學」主體性的敘述脈絡，同時沒法穿透在新文學史裡無形的殖民權力。

2003 年起，隨著香港保育抗爭、保存集體記憶、反對政策等社會運動頻繁，文學的地誌書寫從歷史情感，轉移至「社區」的空間。本地學者陳智德在地誌文學上，進一步提出「社區文學」（community literature）的概念，提倡地誌文學應由思考個人身分認同，轉化成推動本地社區認同（sense of community）的書寫模式。⁸⁴ 陳氏主張發掘「文學」的社區營造（community empowerment）功能：「社區文學的意義絕不只是寫本土地方或記錄事件，而是發展、引申與社區相關的人文活動，包括生活、情意和評論」，⁸⁵ 比較之下，盧氏的本土經驗是有關「過去」的，而陳氏的本土經驗是有關當下和未來的。盧氏以《散步》點出了「新文學」與「香港文學」邊界尚未清晰、「香港文學」的本質仍然朦朧之際。這些保存了不同空間意義的文學地誌、地誌文學，可以如何為新文學史與香港文學史打開了新的對話方式，誠為本文應當延伸之研究議題。

⁸⁴ 陳智德：〈社區保育與社區文學〉，《信報》，第 24 版（2006 年 8 月 12 日）。

陳智德：〈社區文學與社區營造〉，《明報》，第 D04 版（2007 年 8 月 27 日）。

⁸⁵ 陳智德：〈社區保育與社區文學〉，《信報》，第 24 版（2006 年 8 月 12 日）。

附錄：《香港文學散步》初版目錄

篇名	著者	寫作時間
上篇：憶故人		
一、蔡元培		
五四歷史接觸	盧瑋鑾	1987.05.04
頑石——蔡子民先生之墓	周策縱	1977.06.25
蔡元培墓前	余光中	1978.04.05
遊蔡元培之墓	黃國彬	1977.06.25
在香港聖約翰大禮堂美術展覽會演詞	蔡元培	1938.05.20
二、魯迅		
彷彿依舊聽見那聲音	盧瑋鑾	1987.05
魯迅赴港演講瑣記	劉隨	1981.02.07
老調子已經唱完	魯迅	1927.03.05 1927.03.11
三、戴望舒之一		
林泉居的故事	盧瑋鑾	1989.05.16
望舒和災難的歲月	葉靈鳳	1957.08.01
山居雜綴	戴望舒	〔不詳〕

篇名	著者	寫作時間
示長女	戴望舒	1945.01.10
香港的舊書市	戴望舒	〔不詳〕
四、戴望舒之二		
一堵奇異的高牆	盧瑋鑾	1987.05.22
回憶望舒	黎明起	1950.04.10
獄中題壁	戴望舒	1942.04.27
我用殘損的手掌	戴望舒	1942.07.03
等待（二）	戴望舒	1944.01.18
五、許地山		
三穴之二六一五	盧瑋鑾	1987.06.02
許地山下世之日	吳其敏	1981.01.21
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史地探略（節錄）	許地山	1941.01
六、蕭紅之一		
寂寞灘頭	盧瑋鑾	1987.06.15
蕭紅墓畔口占	戴望舒	1944.11.20
蕭紅墓發掘始末記	葉靈鳳	1957.08.03
七、蕭紅之二		
幽幽小園	盧瑋鑾	1990.06
憶蕭紅	周鯨文	1975.11.07

篇名	著者	寫作時間
下篇：臨舊地		
八、孔聖堂		
文化殿堂	盧瑋鑾	1990.06
紀念巨人的誕生	郡嬰	1940.08.03
三個作家講文藝問題	〈華僑報〉 報導	1948.05.06
九、學士台		
學士台風光	盧瑋鑾	1990.06
薄覺林雜記	施蟄存	1940.06.20
懷鄉小品	穆時英	1938.02.11
十、六國飯店		
文藝的步履——六國飯店懷舊	盧瑋鑾	1990.03.12
月落烏啼霜滿天	王火	〔不詳〕
一九四七年詩人節宣言	黃藥眠等	1947.06.23
十一、何福堂中學		
民主禮堂	盧瑋鑾	1990.06
論民主運動中的高等教育	黃藥眠	1947.01.01
誠摯的獻	白雲	1947.01.01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 年。
2. 小思編著，岩佐昌暲、間ふさ子譯：《香港文学散步》，福岡：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較社会文化学府国際言語文化講座，2005 年。
3.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7 年。
4.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 年。
5. 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第三次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9 年。
6. 王劍叢：《香港文學史（電子本）》，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年。
7. 永井荷風著，林皎碧譯：《荷風の東京散策記》，臺北：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2013 年。
8. 易明善：《香港文學簡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 年。
9.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10. 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年。
11.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
12. 張美君、朱耀偉編：《香港文學 @ 文化研究》，香港：牛津

大學出版社，2002年。

13. 陳大為：《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 1980-1999》，臺北：萬卷樓圖書，2001年）。
14. 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新詩卷》，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14年。
15.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
16.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
17. 潘亞暎、汪義生：《香港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年。
18.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
19. 盧瑋鑾（小思）編著：《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1991年，初版。
20. Crang, Mike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
21. Cresswell, Tim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
22. Cosgrove, Denis E..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London: Croom Helm, 1984.
23. Miller, J. Hillis. *Topograph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4. Relph, Edward.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25.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二、學位論文

1. 盧瑋鑾：〈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藝活動，1937-1941〉，香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學位論文，1981 年。

三、期刊論文

1. 〔作者不詳〕：〈稿例〉，《八方文藝叢刊》，第一輯，1979 年 9 月，頁 21。
2. 王宏志：〈怎樣去界定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書寫的一個最基本問題〉，《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8.2 及 9.1 卷，2008 年 1 月，頁 22-39。
3. 林淑貞：〈地景臨現——六朝志怪「地誌書寫」範式與文化意蘊〉，《政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59-193。
4. 唐睿：〈文學地景中的身份意識——從文學散步到地景書寫〉，《人文中國學報》，第 25 期，2017 年 12 月，頁 169-192。
5. 黃俊東：〈三、四十年代香港文壇的回顧〉，《開卷月刊》，總第 11 期，1979 年 11 月，頁 37-41。
6. 黃維樑：〈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香港文學》，第 27 期，1987 年 3 月，頁 22-28。
7. 趙曉彤：〈造筏不渡河——從盧瑋鑾日本遊學經驗論其香港文學研究方法之承傳〉，《中國現代文學》，第 30 期，2016 年 12 月，頁 199-221。
8. 鄭樹森：〈殖民主義、冷戰年代與邊緣空間——談四十年來香港文學的生存狀況〉，《素葉文學》，第 52 期，1994 年 4 月，

頁 20-23。

9. 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香港文學》，第48期，1988年12月，頁9-15。
10. 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誌書寫〉，《成功大學中文學報》，第29期，2010年7月，頁143-160。
11. Hernández, B., et al..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Natives and Non-Nativ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7(December 2007): 310-319.
12. Proshansky, M. Harold.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0,2(June 1978): 147-169.

四、報刊文章

1. 陳智德：〈社區保育與社區文學〉，《信報》，第24版，2006年8月12日。
2. 陳智德：〈社區文學與社區營造〉，《明報》，第D04版，2007年8月27日。

五、網路資料

1. 「香港文學地景資源庫」，網址：<http://hkliteraryscenes.wikidot.com/about>，瀏覽日期：2019年11月11日。

